

# 國際法律規範的認知與評價： 現實主義的觀點

譚偉恩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

## 摘要

國際關係在客觀上所呈現出的無政府狀態並不同於混亂和無序。國家所生存的國際社會在事實上是一個自助與合作並存，權力與法律相輔且互為制約的結構。因此，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者應如何解釋國際法律規範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遂成為理論研究的一項重點。本文以現實主義作為切入點，探討與評析該理論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認知和評價。基於現實主義並非單一的理論而是為一研究典範，故本文在內容上分別從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包括守勢與攻勢兩種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以及較為一般人忽略的英國學派等現實主義理論的派別中去探討國際法律規範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及功能。結論指出，長期以來人們對於現實主義的理解受限於權力政治這樣的標籤，從而視現實主義與國際制度或國際法為水火而不相容！但事實上，採用現實主義理解國際關係，不意謂著就必須對國際法持以否定的態度。毋寧，在現實主義與國際法律規範之間，存在的不是一種絕對的互斥關係。非結構理論型的現實主義，如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即是採取正面肯定其功能的態度。

**關鍵詞：**國際法律規範、古典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英國學派

## 壹、前言

回顧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歷史過程，曾先後出現多種不同的理論，諸如：理想主義 (idealism)、現實主義 (realism)、新自由制度主義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以及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等。這些理論反映出研究者思考國際關係的不同觀點與研究方法。面對內涵包羅萬象的國際關係，有些理論傾向物質主義或客觀因素的分析，例如：現實主義強調權力 (power)、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和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另有些理論則是比較強調規範 (norms) 或是觀念 (idea) 的因素，譬如：建構主義強調認同 (identity) 和共享知識 (shared knowledge) 對於社會關係的建構具有重要的影響。

由於不同的理論看待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故而對問題的切入點和獲得的研究結果也有所差異。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是一個內容豐富而複雜的研究典範 (paradigm)，是由許許多多不同分支集合而成的理論家族。在該項研究典範中，有以人性出發的古典現實主義 (classical realism)，有以客觀體系結構為立論核心的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其中又因對無政府狀態的解讀不同，而分成較為樂觀的「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 和較為悲觀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有以結合體系和單元兩個層次為研究方法的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以及向為人遺忘與輕忽，但在內容上具有歷史傳統和本體論上主張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的英國學派 (English School)。

本文擬就現實主義各個支派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觀點提出一綜合性說明。對個別支派的理論特色、假設前提和對國際秩序的看法進行探討與分析，其中關鍵在於各分支理論建構其內容的分析層次為何。簡言之，理論所選擇的分析層次不同，對於國際法的評價與定位便所有差異；個體或單元層次者，傾向接受與肯定國際法律規範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而體系層次者，則明顯易對

國際法律規範採取輕視的態度。

## 貳、國際法律規範的定義

本文所指的國際法律規範係一廣義的概念，包含了習慣國際法、文明國家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各種的國際條約、公約或協定。甚至在某程度上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或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具有近似的意義。<sup>1</sup>

所謂國際建制，學界間最常用，同時也是較無爭議的定義是克萊斯納（Krasner）所提出的：「國際建制可被定義為一組間接的或直接的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有人譯為法條）及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sup>2</sup>不過，雖然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共同構成了「建制」，但是在一

<sup>1</sup> 參考：Abumohammad Asgarkhani, *Hegemony, Challenge and Compromise [microform]: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as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in Conflict Resolu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January 1981-January 1993*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 1995);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也認為國際法與國際建制和國際制度是相近的，因為它們都是國家彼此協商而達成的法律規則（rules），詳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406 (Ch. 1, note 25). 相似的觀點，不同的涵蓋範圍請參考：Anthony C. Arend, *Leg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28. 準此，本文擬借助上開學者間對於建制或制度的有關說明或解釋，作為國際法律規範此項概念的定義。

<sup>2</sup>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 文中作者進一步指出：原則是對事實、因果和正義的信仰；規範是行為的標準，由權利和義務來界定；規則是對行為的詳細規定；而決策程序是在制訂和執行集體行動時所採用的方式。另外，建制中的參與者會將他們的「預期」聚焦於一個既定的議題領域（a given issue-area），而非視建制為全然依據權力或利益而調整的暫時性協議。

般文獻中對於原則和規範的分析似乎比對規則和決策程序的分析來得多與強調。這可能是因為前二者是建制構成的基礎，比較不易變動，而後二者就某方面來說是原則與規範的具體化，在條約或協定中可以輕易獲得証實。

國際建制同時又與「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這兩個名詞常被人混淆使用。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1984年提出制度(institution)一詞時，對其並未提供一完整的解釋或將之與建制(regime)作一區隔，甚至在日後所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將兩者交互使用，而學界在進行討論時，有些論述也並未將兩者予以嚴格的區分。<sup>3</sup> 準此，本研究計畫對國際法律規範採取一廣義化的定義，也就是內容上包含了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建制以及國際制度等國際社會中有關秩序性的機制或安排。

### 參、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人們對於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的研究與觀察，多半只看到了該理論全貌的一個「大」部分；而忽略了其中的一個「小」部分。<sup>4</sup> 事實上，以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其理論內涵具有兩個面向；既有強調國際政治中權力平衡的現實與必要，又有關注規範、道德在國家間政治

<sup>3</sup> 國際建制與國際制度之定義有相當的重疊性，在1980年代中學者並未對此加以區分。可參閱 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1 (1986), pp. 104-122.

<sup>4</sup> 以摩根索為核心代表人物的古典現實主義在強調權力的同時，對於非權力的因素在國際政治中所發揮的影響也給予關注。舉例來說，摩氏追求的是「政治」權力的權力政治，而非是單純物質(例如：軍事力量)的權力。他反對把主張權力政治等同於是強調武力，請參考：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sup>th</sup>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p. 32-35.

所扮演的角色。<sup>5</sup> 摩根索認為，維持國際和平有兩種方式：一是源自於社會中力量的自我調整機制—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一是透過國際法或國際道德所形成的規範性限制。<sup>6</sup> 法茲奎（John Vasquez）與艾藍森朵夫（Peter Ahrens Dorf）認為，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關係研究有下列的貢獻：<sup>7</sup>

- 1、把政治的現實與期待予以區分，明確了現實主義與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的區別。
- 2、提出現實主義三個最基本的核心假設：（1）民族國家及其決策者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行為者；（2）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不可等同視之，外交政策中過於道德化的贖世思想應予避免；（3）國際關係就是國家間為權力及和平所展開的鬥爭。
- 3、重塑現實主義內涵中的霍布斯理論（Hobbesian theory），將道德及法律融入。亦即在國家彼此戰爭及衝突的過程中，不忘對和平與秩序的追求。<sup>8</sup>

摩根索對於國際法的認知其實是非常宏觀的，他從「歷史」的脈絡中理解並證實了國際法律規範存在的必要性，<sup>9</sup> 進而肯定

---

<sup>5</sup> Thomas C. Walker, "Introduction: Morgenthau's Du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24, No. 1 (1999), pp. 1-4.

<sup>6</sup> 權力平衡雖然是維持國際和平與秩序的方法，但其係源自於若干知識與道德的因素。這些因素使得國際間的權力鬥爭不會成為毫無節制性的競賽。參考：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Ch. 11, 15-18. (especially can refer to pages: 223, 236-238.)

<sup>7</sup>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pp. 899-900; 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19, 26-30.

<sup>8</sup> Peter J. Ahrens Dorf and Thomas L. Pangle, *Justice among Nations: On the Moral Basis of Power and Peace* (Lawrence, K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 pp. 226-231.

<sup>9</sup> Hans J. Morgenthau,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ory,"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國際法律規範的存在，而未對國際法採取極端地否定態度。<sup>10</sup> 另一方面，從國際法權力分散的本質切入，提出創立國際法的兩項根本因素：國家相互的同意和對於國際法的需要。<sup>11</sup> 摩根索將國際法視為是人類政治一項偉大的轉變，該項轉變象徵人類歷史從中古時期(Middle Ages)進入現代，也就是由封建制度(the feudal system)轉變為領土國家制度(territorial state)。在領土內擁有最高權力的政治單位，也就是主權國家的政府，彼此因為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斷接觸，若要維持一定程度的往來和平與秩序，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某些法律規範來處理彼此間的關係。舉例來說，國家必須知道它們的領土疆界在哪，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享有領土的有效管轄權。也就是說國家必須知道對於居住在它們國境內的外國公民和居住在國外的本國公民，它們能行使何等的權力及權力的界限。

摩根索認為，當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結束了宗教戰爭，並使領土國家成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基礎時，那些規定國與國之間相互權利和義務的一些核心國際法律規範即已確立。在國際法存在的四百多年中，絕大多數的情形國際法都受到國家嚴格地遵守，因此否認國際法的存在，以及認為它不是一項有拘束力的規範是與事實相違的。摩根索表示，輿論一向偏好關切某些特殊的國際法律規範現象，諸如：1928年的巴黎非戰公約(又稱凱洛格—白理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國際聯盟盟約(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聯合國憲章(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而這些文件的效力通常是存有爭議和疑問的，且並不足以代表有關領土管轄、外交領事人員豁免等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9-40.

<sup>10</sup> 相較於結構現實主義，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是正面的對國際法提出分析與評價，而非採取迴避或是否定國際法功能的虛無論態度。相關說明可參考：徐曉明，「權力政治學派不是國際法虛無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2002年)，頁66-68。

<sup>11</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p. 293-297.

傳統的國際法規則。然而，摩根索也表示，承認國際法並非等於接受其與國內法具有同樣程度的法律效力，更不是代表國際法具有限制國際間權力鬥爭的功能。事實上，國際法的本質是一種權力分散且沒有嚴密組織的規範集合體，它比較偏向是一種法律的原始態樣（primitive type of law）。<sup>12</sup>

國際法的權力分散性（the decentralized nature）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國際社會是由個別的主權國家所組成，由於主權國家在它們各自的領土境內是至高無上的權力單位，所以國際社會的一項特徵就是沒有一個制定國家共同法律規範和執行此等規範的中央權力機構。摩根索說，國際法的存在和其作用的發揮係基於兩個因素，而這兩個因素在性質上都是權力分散的；一是個別國家利益的一致或是至少互補；一是國家間權力的均勢分配（即權力平衡）。<sup>13</sup> 毋寧，國際法是一種客觀社會力量間相互作用的結果。根據摩根索的看法，國際社會實際上是處於一種權力分散的無政府狀態，沒有統一的立法機關，也沒有具有強制力的執法機關或司法機構。國際法所擁有的制裁方式不是如國內法那樣系統化的，而是虛弱與不確定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結果可能令人難以滿意，尤其是對那些力量較弱，不能有效主張自己權利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摩根索說：「沒有一項制度比國際法的執行制度更為虛弱；因為國際法的執行完全建立在侵

---

<sup>12</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 295. 國際社會中的秩序是在一種「水平」方向式的互動中形成，而非透過如國內政治那種層級節制的「垂直」模式。參考：Henry S. Maine, “Primitive Society and Ancient Law,” in Henry S. Maine ed., *Ancient law* (New York: E.P. Dutton & Co., 1917), pp. 123-185.

<sup>13</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 296. 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奧本海（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在其書中也曾表示過相同的見解。參考：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2<sup>nd</sup>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2), p. 193. 進一步分析與說明可參考：Benedict Kingsbury, “Legal Positivism as Norm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lance of Power and Lassa Oppenheim’s 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No. 2 (2002), pp. 3-6, 15-16.

權者與受害者之間權力分配的情形上。」<sup>14</sup>

執行功能的缺陷在於國際法本身欠缺一履行的機構，和立法、審判的功能相比，國際法的執行功能是絕對的權力分散。首先，國際法的執行依附在國家間權力的分配情形，這使得強國可以違法，但卻能免於被執法的制裁。而弱國的權利如果受到侵害，只能仰賴強國的幫助，但強國是否幫助卻往往取決於具體事件的政治考慮和當時國際間權力分布的情形；其次，摩根索認為國際法的執行與國家間利益的一致性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國際法律規範中大部分的原則便是反映國家間互補的利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些原則或規範會自動的被國家履行，而不必透過特別的執行機制。因而，國際法在多數情形下，反而並未受到執法功能欠缺的影響。<sup>15</sup>

對於上述國際法律規範權力分散的本質，及其在功能上所展現出的虛弱性，摩根索進一步就國家主權原則的面向切入，探究國家主權的根本性質和主權原則對於現代國際政治所產生的影響。<sup>16</sup> 主權 (sovereignty) 的觀念是在十六世紀後半葉形成的，與當時出現的民族國家 (national states) 現象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國家疆界的逐漸確立，在一定的領土內開始出現一個集中性的權威。當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時，主權為領土內最高的權力，已是一項不爭的政治事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主權原則將這項事實提升到法律理論的層次。<sup>17</sup> 在有法律效果作為基礎的前提下，主權原則衍生出兩項在邏輯上相悖的假設：一是，國際法對

---

<sup>14</sup> 國家間的權力平衡和共同利益，對於法律體系的三大核心功能，即立法、審判和執行，造成了阻礙。參考：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p. 296.-313.

<sup>15</sup> *Ibid.*, pp. 312-313.

<sup>16</sup> 學者荷茲 (John Herz) 曾表示，在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時代，關於權力政治的出現乃是一項無法避免的事實。此話可說是間接將無政府狀態與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劃上等號。詳見：John Herz,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 McKay, 1976), pp. 79.

<sup>17</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 328.



於國家的行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二是，國家雖然受到國際法的制約，但他們基於主權原則，卻是制定國際法與執行國際法的最高權威。<sup>18</sup> 毋寧，主權原則一方面讓國家對於特定範圍領土的權利獲得保障；另一方面，卻因此造成國際法的權力分散和執行功能的軟弱無力。

由此可知，摩根索將國際法理解為是一種權力分散的法律秩序。因為，國際法只能對已經表示同意或者簽署條約的國家具有拘束力。<sup>19</sup> 其次，即便許多規則是已經被同意的，但它們常常是含糊不清、模稜兩可的，不是附帶許多的條件，就是有保留規定的限制。<sup>20</sup> 這使得國家在應該遵守國際法的時候，仍然享有高度的彈性和行動自由。前一種情形，對於國際法的立法功能造成傷伐，而後一種情形則是對國際法的審判和執行功能造成減損。

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摩根索依序推演出「獨立」、「平等」及「全體一致」等三個主權原則下的核心概念：<sup>21</sup>

1. 獨立顯示出每一個國家可以依其意志，自由地管理其內政和外交事務，除非某項條約中有相反的規定，不然獨立已是所有國

<sup>18</sup> *Ibid.*, p. 329.

<sup>19</sup> 惟實際上仍有少數國際法律規範的存在，非源自於國家的同意。此等規範或可說是任何法律制度得為建立與存續之必要先決條件（precondition）。例如：解釋法律的規則與執行法律的規則，或者是一個在多數國家法律規範中存在的必要規則，譬如個別國家管轄權的界定。這些規則對於所有國家均有拘束力，姑不論國家是否同意，它們可以說是現代國家制度以及國際政治得為運作的必要法律規範。而它們的拘束力實際上也未影響個別國家的主權，反而是幫助國家主權的法律性質更加確立。參考：Arend, *Leg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op. cit.*, pp. 52-53, 60-61; Oscar Schacht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M.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p. 104.

<sup>20</sup> 關於「保留」(reservation)的一個著名國際法成案，便是尼加拉瓜控美案。相關部分請參考：Case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of 27 June 1986), para., 36-56,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www.icj-cij.org/icjwww/icas/inus/inus\\_isummaries/inus\\_isummary\\_19860627.htm](http://www.icj-cij.org/icjwww/icas/inus/inus_isummaries/inus_isummary_19860627.htm), (12 May 2005) and *Treaty of 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1956), which provides an independent basis for jurisdiction under **Art. 36, para. 1**,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up>21</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 330.

家存在的一項必要特徵。故而，尊重個別國家的獨立性，成爲近代國際政治和國際法中的一項責任與義務。

2. 平等是國家主權的同義辭，一個享有主權的國家自然不能容許在其管轄的領土內有另一個高於它的權威存在。國際法是涉及地位相互平等的構成員間之法律，國家雖然受制於國際法，但不從屬於任何其他國家。<sup>22</sup>
3. 全體一致的概念則是上述國家地位平等觀念的延伸。意指關於國際法的立法，所有國家均具有平等的權力，不因領土、財富或是國力的大小而有所區別。這個概念使每一個國家在參加國際立法的過程中，均有能力替自己決定是否要接受一項法律規範的約束。<sup>23</sup> 也就是說，在任何創立國際法律規範的集會中，大國（例：美國）的一票和小國（例：諾魯）的一票是等同價值的，若欲使某項新規定對此兩國具有拘束力，則兩國的同意票都是必須而不可或缺的。

綜上所述，貿然地將現實主義與國際法否定論劃上等號是錯誤的。事實上，現實主義中的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有相當深入的探討，其代表學者摩根索在其著作《國家間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一書中，清楚表達了對於國際法並未採取排斥否定的立場，他肯定國際法的存在和作用，從國際間權力的分散性、國家彼此間利益的共同性，以及國家主權原則等三個方向論述了國際法在本質及功能上的限制。<sup>24</sup> 一方面與現實情況相一致地的

<sup>22</sup> 國與國間的平等原則，可參考聯合國憲章第二條一項的規定。“The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 Equality of All its Members,”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aboutun/charter/index.html>, (12 May 2005).

<sup>23</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p. 331-332.

<sup>24</sup> 關於主權與國際法的關係，尙可參考：H.L.A. Hart, “International Law,” in Robert J. Beck, Anthony C.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eds.,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6-74.

描述國際法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忠實地呈現出國際法在功能上的極限，以配合其政治現實主義的核心觀點—權力政治。<sup>25</sup> 所以，總的說來，以摩根索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的認知是採取一種「弱法主義」。既不過於理想的相信國際法是維持國際秩序的萬靈丹，也不偏激的否認國際法對於國家行為的拘束力。

另一位著名的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卡爾（E. H. Carr）也係採取類似的觀點。卡爾認為，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一種是烏托邦主義，即理想主義；一種是現實主義。而這兩股勢力其實也就是權力與道德的化身。<sup>26</sup> 卡爾認為這個世界上沒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麼是道德？國家應如何遵循國際道德？則是全然迥不相同之事！他說：國際關係的實質是權力，所謂的道德，或是國際秩序的維持、國際組織的建立，不過只是維持現狀國家的口號，不滿意現狀或有能力改變現狀的國家並不會認同，也必定會透過各種方法（包括武力）去打破。在這個理論前提下，卡爾進一步針對威爾遜的觀點提出質疑，並重點闡釋了國家與個人不適用同一道德標準的現實主義。他指出，國家不會因為做出損人利己的不道德行徑而遭受國民的非難，而國際道德規範往往又需要借助某種外部強制方得以實施。國家在國際關係上竟然作為獨立的政治權力單位，在其之上自然是沒有任何更高的權威能把道德準則強加給國家。<sup>27</sup>

不過吾人應注意，卡爾雖然反對國家行為應遵守與個人相同

---

<sup>25</sup> 摩根索的權力政治理論有其自己的特色，摩氏雖然強調權力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但並未認為權力平衡能帶來世界和平。權力平衡在其理論中僅是對於秩序的維持和國際法的發展具有一定程序的裨益，但仍有不確定性和功能不足的缺點。因此，他認為維持國際和平最好的方式是透過外交，以說服、談判等技巧來維繫國家間和諧的關係。參考：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Ch. 31.

<sup>26</sup>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56), pp. 11-12.

<sup>27</sup> *Ibid.*, 63-71.

倫理標準的理想主義，但也非全然苟同馬基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或黑格爾 (Georg Wilhelm Hegel) 等人所認為的國家間關係只受權力支配，道德在其中全然不起作用的悲觀看法。毋寧，卡爾的立場與摩根索相似，是採取一種「務實的」政治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中權力的作用較大，而道德的作用較小。任何國際道德與規範的維持必須務實的基於大國的霸權來予以支持。至於道德的訴求則應該是合乎實際的，而非過於理想的。簡言之，卡爾雖然對烏托邦主義過於理想及忽略歷史教訓的論述提出批判，但也認為現實主義對歷史的認知過於悲觀，導致陷入一種宿命論，而無法解釋人類思想可以改變行為的事實。<sup>28</sup>

總的說來，古典現實主義從國際社會的客觀現象來觀察與理解國際法，透過解讀權力平衡的現實和國家共同利益的存在，闡明國際法律規範對於維繫國際社會某程度的和平與秩序，存在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是一種「務實的」國際法存在論，對於國際法的評價是弱法主義而非虛無主義！

## 肆、結構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一般較易於將所謂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 視為由學者華茲 (Kenneth N. Waltz) 所代表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的同義詞，並在使用上對兩者未加區分，甚或交互使用。<sup>29</sup> 惟自九〇年代開始後，現實主

<sup>28</sup> *Ibid.*, 92.

<sup>29</sup> 由於華茲在其書中強調了「結構」對於系統成員的影響，並對政治結構(特別是國際政治的結構)做出了詳盡的說明和解釋，因而使其現實主義理論獲得了「結構現實主義」的封號。參考：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73-77, 88-99. 而在學術討論上，亦有人將結構現實主義稱之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參考：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義的理論研究典範 (research paradigm) 中，<sup>30</sup> 又增添了「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與「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 兩支新的流派。<sup>31</sup> 前者，因在理論的核心敘述上，同樣係以結構為重，強調結構對於體系成員的支配力與作用，故而學者以其理論內容的另一特徵—國家行為者對於權力無止盡的追求，為其命名，並以之和主張國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權力最大化的「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 相區隔；<sup>32</sup> 後者，理論

---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19. 而國關學者中有將華茲國際政治理論一書視為是守勢現實主義的代表作者，詳見：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第十八期（2003年），即將出刊發行。*政治大學*，<http://www3.nccu.edu.tw/~ykwang/Defrealism.pdf>, (14 May 2005)。用語上使用結構現實主義的學者，如：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5; Patrick Jame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2 (1995), pp. 181. 使用新現實主義的學者，如：James C. Hsiung, *Anarchy & Order: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 42;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 90. 而將結構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混用的情況，可見之於：Andrew K. Hanami,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30</sup> “realism is a paradigm, not a theory.” See: Stephen Van Evera, “Elements of the Realist Paradigm: What Are They?” the Typescript on January 27, 1992, quoted from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 xiii.

<sup>31</sup> 關於攻勢現實主義此一用語的出現，學者一般認為是濫觴於史奈德 (Jack Snyder)，而他的用語係使用「侵略性現實主義」(aggressive realism)。詳見：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至於新古典現實主義，最初係由學者羅斯 (Gideon Rose) 提出，參見：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sup>32</sup> 例如考夫曼 (Robert Kaufmann) 稱攻勢現實主義為「悲觀的結構主義者」(pessimistic structuralists)，守勢現實主義為「樂觀的結構主義者」(optimistic structuralists)。詳見：Robert G. Kaufmann,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的主要核心是聚焦於國家的外交政策，認為它會受到國際體系，特別是體系構成員間「相對物質權力」(relative material power)的影響。因此認為相對的物質權力將決定一國外交政策的主軸或其對外行為的模式，而國家領導人對物質權力的認知與判斷則扮演著中介變數的角色。<sup>33</sup>

本節擬分成三個部分，個別就結構現實主義中的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以及結合體系和單元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中有關國際法律規範的論述，做一統整性的介紹及說明。

### 一、守勢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以學者華茲 (Kenneth N. Waltz) 為代表的守勢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亦有人稱之為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係以權力作為分析方式和認知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sup>34</sup> 是項理論的核心可簡要為下列五點：

#### 1、國際政治結構的無政府狀態；<sup>35</sup>

---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4 (1994), pp. 682-683. 在論述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時，學者斯耐德 (Glenn Snyder) 曾撰文從學理上分析了其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區別。可參考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2002), pp. 151-155.

<sup>33</sup> 此一觀點係源自修西德德 (Thucydides) 「強者得任性恣意而為；弱者僅能默默承受苦難」的現實主義思考，可參考：Alexander Kemos, "The Influence of Thucydides in the Modern World," *Point of Reference* (Fall 1994), *Hellenic Resources NetWork*, <http://www.hri.org/por/thucydides.html>, (23 May 2005), and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3-24.

<sup>34</sup> 關於守勢現實主義的重要代表文獻可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rles L. Glaser, "Realism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0-90;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25, Vol. 3 (2000/2001), pp. 128-161.

<sup>35</sup> 無政府狀態 (anarchy)，幾乎已被國際關係研究者視為一項國際關係的基本事實，是理解國際政治的基礎。相關論述及說明可參考：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14-115; Helen Milner, "The

- 2、國家依據權力的大小確定各自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和處事方式（不必考量國際法）；
- 3、各國對外交往的立足點是「安全」最大化；
- 4、國家間的合作因為相對獲利（relative gains）問題而難以實現；
- 5、國際秩序的建立主要依靠大國來維繫，其方法為權力平衡。<sup>36</sup>

華茲的守勢現實主義雖然繼承了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將權力與外交視為國際政治的主軸，但另一方面卻將國際法律規範排除在外。由於將研究焦點置於「結構」，華茲從無政府狀態此一國際關係的特徵中推導出自助（self-help）這個隸屬於無政府體制的本質。由於自助是國家求取生存最可靠的手段，故而權力的追求便成為國家政策的核心。<sup>37</sup> 在上述這樣一套論述的邏輯裡，國家自助的行為意謂著，國際法在國際政治中很少或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影響。雖然，華茲的守勢現實主義沒有針對國際法做出特別的否定論述，但其認為國際政治的特徵便是缺乏秩序，同時也對國際法抱持著懷疑的觀點。此點可從該理論將自助和權力作為理

---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5;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7-118;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

<sup>36</sup> 但華茲以外的守勢現實主義學者，則從軍事的角度將權力區分為攻擊性能力與防禦性能力，並主張若能將攻守能力納入考量，則可修正與補足權力平衡維持國際秩序穩定此一說法的缺陷。參考：Charles L. Glaser, “Realism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op. cit.*, pp. 62-63;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1 (1978), pp. 167-214.

<sup>37</sup> 為何華茲強調權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其理由為：（1）權力是國家維持本身獨立自主的最佳工具；（2）權力大的國家政策選擇較自由；（3）權力大的國家在與別國交往過程中較安全；（4）有強大權力的國家較有能力維持系統的秩序，對這種國家來說，秩序的維持對其本身也有利。詳細說明請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54-255.

解國際關係諸多現象的前提條件，而沒有對國際法給予任何的評論得知。

華茲的守勢現實主義將權力本身視為國際政治中「鐵」的律法。<sup>38</sup> 在其書中提到，國內政治體系是「權力集中」且具層級性質；國際政治體系則否，構成員間是相互協調的關係，並且至少在形式上是彼此平等的。沒有國家享有命令的權利；也沒有國家具備服從的義務，這是一種權力分散的狀況，是國際政治無政府的體現。<sup>39</sup> 國家主權 (sovereignty) 象徵著國家能自行決定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包括如何與他國進行互動，但並非代表主權國家能為所欲為，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說得更清楚些，國家之間的差別不在於彼此的功能或是追求的目標，而是在於能力上的不相等。國際政治結構中因為沒有國內政治那種層級隸屬的分工現象，因此相互間的差異完全取決於個自權力的多寡。<sup>40</sup> 國家因其權力的不同，而在國際政治中處於不同的地位。

除了對權力和自助的強調外，華茲的守勢現實主義還吸取了

---

<sup>38</sup> 華茲以外的守勢現實主義學者雖然也贊成權力是達成國家安全的有效手段，但在論述國際政治的權力時，比華茲要顯得樂觀。他們強調在某些情況下國家是可以進行合作與溝通的。例如，當軍事能力可以區分攻守時，對於攻勢武力的軍控就有助於安全；若是無法區分時，國家透過裁軍協議也能達成類似的效果。因此就這項差異而言，非純粹結構性的守勢現實主義，似乎給予國際制度或建制較多的運作空間。參考：Charles L. Glaser, "Realism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op. cit.*, pp. 67-70;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op. cit.*, pp. 134-135.

<sup>39</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88. 或許這個世界並非處於一個純粹的無政府狀態 (其實無政府狀態和層級結構型的秩序是政治光譜的兩端)，對於國際社會型態的描述可以做得更為精緻，以更接近事實。但是華茲認為這會減少理論的解釋力，如果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解釋現象而非描述，那麼詳盡的區分便可以省略。參考：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4。另外，華茲與摩根索同樣觀察到國際政治中權力分散此一特徵，惟兩人對之理解不同。摩根索認為權力分散對國際法律規範的衝擊有限，至多使其為一「弱法」，但華茲則認為權力分散正好突顯出國內與國際政治「結構上的差異」，致使後者的成員傾向透過自助而非法律來解決問題，進而推導出國際法的「虛無」。

<sup>40</sup> 華茲認為國家間能力的分配是一種屬於系統的概念。詳見：*Ibid.*, pp. 97-98.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觀點，即認為國家間的戰爭是一種自然狀態。<sup>41</sup> 華茲指出，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任何有效的制度能夠預防或避免戰爭，換句話說，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因此，在國際政治中，武力不僅是國家最後的手段，而且事實上也是最重要和永恒的手段。<sup>42</sup>

不過華茲也同時表示，即使在國內，人民以武力或是暴力方式對抗政府的情形也同樣存在，而且可能更為血腥。所以嚴格來說，守勢現實主義並未認為無政府狀態相較於有政府狀態是一種比較危險的情況，國家雖然有時傾向使用暴力，但有時也不排除合作的可能。<sup>43</sup> 然而，國家間的合作充其量只能讓彼此鬆散的湊在一起。<sup>44</sup> 這是因為，國家間的合作（也就是彼此的互賴）受到下面三種原因的限制：（1）國家對於相對獲利（relative gains）的憂慮。國家會擔心其他國家透過合作獲得較多的好處，而不是在乎自己得了多少好處；<sup>45</sup>（2）擔心彼此交換所需資源的結果會

---

<sup>41</sup> Charles R.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6.

<sup>42</sup>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3. 其他學者，如吉爾平（Robert Gilpin）也曾提及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個人和群體可以追求真理和正義，但所有這些高尚目標的追求，只有以在群體的權力鬥爭中能夠確保個體的安全為條件時，才有意義。可參考：Robert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05.

<sup>43</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13-114.

<sup>44</sup> *Ibid.*, pp. 104-105.

<sup>45</sup> 因為守勢現實主義特別重視國家的生存利益，而不是全然純粹的權力追求（權力對守勢現實主義的意義在於它是維持國家生存的工具或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因此推演出國家對於「相對實力」的敏感性。這種相對實力是他們安全和獨立地位的基礎。也就是說，國家的主要目標不是追求獲利的最大化，而是阻止其他國家相對實力的增強。詳見：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7-88. 由於各國追求阻止其他國家相對能力的增長，導致國家在國際關係的互動過程中，是以他國的行為來作為本身政策訂定的基礎。故學者格里科（Joseph M. Grieco）認為國家的特點是位置性的（positional）而非單位性的（atomistic）。詳見：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導致自己依賴其他國家的程度日益增加。<sup>46</sup> (3) 欺詐的問題。<sup>47</sup> 此外華茲本人認為，當合作程度越深，接觸就越多，摩擦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歷史證明，最慘烈的內戰和國際戰爭都發生在種族接近，來往密切的組織或國家之間。也就是說，如果相互依賴的程度超過國家所能控制的範圍時，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就升高。華茲說：在一個以自助為特徵的體系裡，只要構成員的數目不多，彼此合作的程度就會降低；<sup>48</sup> 體系會變得較有秩序與和平。<sup>49</sup> 爲了證明此項觀點，他以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爲例，說明國家間的合作並無法利於國際制度與規範的建立或存續，更遑論維繫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sup>50</sup>

從以上華茲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守勢現實主義並不排斥無政府狀態下有秩序存在的事實，只是該理論下的秩序是國家靠自助方式建立的。例如國家以取得強大的權力來維持已身的安全和與他國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關係。<sup>51</sup> 由於華茲不傾向國際體系中構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op. cit.*, pp. 127-128.

<sup>46</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06-107.

<sup>47</sup>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op. cit.*, pp. 117-118, 122-124.

<sup>48</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45.

<sup>49</sup> *Ibid.*, p. 138.

<sup>50</sup> *Ibid.*, pp. 158-159.

<sup>51</sup> 無論國際政治所呈現的情況有多混亂，秩序的客觀存在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守勢現實主義儘管沒有對國際秩序與合作做出積極的評價，但至少必須對秩序爲何存在的事實做出解釋。吉爾平 (Robert Gilpin) 認爲，雖然國際體系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但各國之間的關係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秩序，體系的運行的確存在對國家行爲的控制因素。詳見：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28. 即便是華茲，也同樣在國家行爲的模式中發現了一種透過權力平衡形成的秩序，那是一種因持續且重複出現的國家間均勢所形成的秩序模式。詳見：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7. 另外，學者鮑德溫 (Baldwin) 表示，無論是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都承認世界政治中存在一定的秩序，儘管兩者在秩序的性質和形成的原因等方面觀點不一致。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成員的數目過多，認為在那種情況下，屬於共同利益的合作事項難以推動。<sup>52</sup> 因此對於國家集體行為準則的創立沒有著墨過多，或投以更進一步的研究興趣。總的來說，守勢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的認知是採取一種類似虛無主義（nihilism）的觀點。<sup>53</sup>

其實在守勢現實主義中，僅有極為少數的研究者對於國際法有做出較為深入的探討。<sup>54</sup> 事實上，除了華茲之外，很多守勢現實主義學者也同樣對國際法律未予以深入的討論。他們多半是著力處理有關規範（norm）的議題，例如：建制（regimes）、規則（rules）以及制度（institutions）等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sup>55</sup> 不過從這些學者有關規範議題的論述邏輯中可以推知，他們在處理的問題其實就是本文所指的國際法律規範。由他們所認知到的國際政治本質來看，守勢現實主義是否認任何的規則、規範或是制度具有「獨立」的功能。因為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必須儘可能的追求權力以保障己身的安全，規範僅僅被認為是一種幫助國家便於達成目的之「工具」。建制或是其它規範性的安排所以會產生，是因為它們能服膺於國家對於利益的追求，一旦這些安排無法再為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

<sup>52</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98; Mancur Olson,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6.

<sup>53</sup> James C. Hsiung, *Anarchy & Order*, *op. cit.*, p. 5; Joel Rosenthal, "What Constitutes an Eth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s is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y Carnegie Council president Joel Rosenthal at the Fletcher School of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 over the 2000-2001 academic year.關於現實主義對國際法律規範的虛無論觀點，在此感謝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王教授元綱提供的寶貴意見。

<sup>54</sup> 在筆者能力所及回顧到的文獻資料中，守勢現實主義學者僅有利伯（Lieber）與熊玠（James C. Hsiung）在其著作中有對國際法進行分析與研究。詳細內容可參考：Robert J. Lieber, *No Common Powe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sup>nd</sup>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1); James C. Hsiung, *Anarchy & Order*, *op. cit.*

<sup>55</sup> 國際法律規範在本文係採一廣義的概念，包含了習慣國際法、各種的國際條約、公約或協定。甚至在某程度上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或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具有近似的意義。參考：本文頁 3 及同頁之註釋 1。

國家獲取利益之時，將會受到鄙視和捐棄。<sup>56</sup> 學者史特蘭琪 (Susan Strange) 更是清楚地表達了現實主義者的立場，他說：如果建制是存在的，那麼對國際政治也只有些微的影響，它們充其量只是一種附隨現象。<sup>57</sup> 因此，對於守勢現實主義來說，真正能影響國家行為的是那些涉及政治和經濟的因素，規範幾乎是被完全地排除在外，或者僅僅是對國家行為及其結果產生微不足道的影響。<sup>58</sup>

此外，由於將規範視為國家實踐其利益的一種工具，因此在守勢現實主義眼中，任何一種特定的規範或是規則通常都是反映國際社會中具有主導力量之大國的目標及利益。<sup>59</sup> 同時，因為將法律規範的發展視為是替國家利益而服務，故而國家在規範與其利益不相符的時候，可以不必受到規範的限制與拘束。

## 二、攻勢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攻勢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 的核心思考是，國際關係是以強權國家 (great power states) 的關係作為主軸，由此等國家間權力分配的情形決定國際政治運作的模式。強權政治 (great power politics) 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所謂的修正主義 (revisionist) 傾向，由於生存與安全的競爭是國際關係的本質，因此國際關係中的強權政治就是一種零和遊戲 (zero-sum game)；每個國家最終的目標就是獲取權力最大化，並以犧牲他國的利益作為代價。<sup>60</sup> 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國芝加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sup>56</sup> 美國對於布雷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的棄守，即是一最佳的例證。參考：Sus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45-347.

<sup>57</sup>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op. cit.*, p. 6.

<sup>58</sup>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op. cit.*, p. 488.

<sup>59</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35.

<sup>60</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

of Chicago) 的米爾斯夏默 (John J. Mearsheimer) 教授，其所著的**強權政治的悲劇**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引起了國際關係學界莫大的回應，也是繼華茲 (Kenneth N. Waltz) **國際政治理論**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後，最具有影響力的現實主義理論。<sup>61</sup>

攻勢現實主義對於國際秩序的理解呈現出一種十分消極的圖象。首先，國際政治中的強權國家不會單純的出於自身考慮而共同促進世界秩序；相反地，它們傾向盡可能的攫取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米爾斯夏默表示，強權國家並非不想阻止戰爭及維持和平，但它們總是優先設法阻止自己成為戰爭的犧牲品。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行為將會受到彼此間相對權力 (relative power) 的影響，因此如果為了建立秩序或和平，而使自身利益陷於可能喪失的風險中，國家便不會輕易承擔此種責任。例如：冷戰期間，美國花費鉅資阻止蘇聯在歐洲揚起戰端，並非因為美國想維持國際和平，而是因為美國憂慮一旦蘇聯在歐洲取得了勝利，原本的權力平衡結構將會產生變化，對美國的安全造成威脅。<sup>62</sup>

其次，強權國家不可能放棄對於權力的關注，而冒然採取促進國際和平的行為。因為它們無法肯定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及努力是否能確實獲得成效。倘若建立和平秩序的努力失敗，國家極可能得為先前忽略權力平衡的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sup>63</sup> 不過米爾斯夏默並非全然排除大國間合作的可能性。他說，國家可能合作，雖然合作有時難以實現。他提出兩個限制國家間合作的因素：對於相對獲益 (relative gains) 的憂慮和對欺詐 (cheating) 問題的

---

<sup>61</sup> Sean M. Lynn-Jones, "Book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2002), pp. 365-366.

<sup>62</sup> 米爾斯夏默表示：無論何時，某種國際秩序出現，大體上都是體系中強權國家自私行為的副產品。詳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49-50.

<sup>63</sup> *Ibid.*, p.51。另可參考：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26-37.

提防。<sup>64</sup> 由於大國非常注重權力的分配，因此，當它們考慮合作時，往往是將焦點置於相對獲益的問題。國家雖然也想增加自己的絕對獲益，但更重的是確保自己在任何合作關係裡不會吃虧。當國家把著眼點轉向相對獲益而不是絕對獲益時，合作自然就會變得困難。<sup>65</sup> 此外，國家對於欺詐的擔心也會妨礙合作。國家會憂慮對手在合作過程中以欺騙的手段獲得可觀的相對優勢，這種擔心在軍事領域更是特別的敏感。<sup>66</sup> 最後，不論國家合作的現象是否已十分普及，它們彼此間的競爭是永遠不可能消除的。只要國際體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和平，因為在國際政治的世界裡，總是充滿著生存與安全的競爭。

在**強權政治的悲劇**一書中，米爾斯夏默雖然沒有針對國際法律規範做出分析與評價，但對於冷戰後日益勃興的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提出了如下的看法：<sup>67</sup>

- (1) 不少學者認為國際組織無論在數量還是促進國家間合作的影響力都在不斷增加。甚至還進一步提出國際組織能抑制

<sup>64</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51.

<sup>65</sup> *Ibid.*, pp. 52-53. 國家合作受限於相對獲益的例子可參考: Paul W. Ss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1994), Ch. 3.

<sup>66</sup> 米爾斯夏默表示，雖然合作存有上述兩項障礙，但現實主義世界中的大國仍然具有合作的可能。權力平衡的邏輯會促使大國結成聯盟，對抗某一時期內共同的敵人。合作的對象可以是盟友也可以是對手，畢竟「交易」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只要結果能反映大國期待的權力分配模式，並讓它們對欺詐的可能感到放心。冷戰期間，美蘇兩強簽定一系列的軍備控制協定就足以說明此點。

<sup>67</sup> 國際組織是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 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基歐漢 (Keohane) 曾表示：國際組織總是隱含在國際建制之中，它們的功能就是監督、管理以及調整建制的運作。組織和建制本身雖然可以分開，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兩者卻是同一事物的正、反面而已。參考：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5. 由於本文所指的國際法係一廣義的概念，包含了習慣國際法、各種的國際條約、公約或協定。甚至在某程度上與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 或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具有近似的意義。因此在探討不同現實主義派別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觀點時，將國際組織也一併納入。

安全競爭、促進世界和平的看法，因為國際組織能使國家放棄追求權力最大化的行爲。對此，米爾斯夏默表示，儘管此一說法認爲國際組織及其影響力有不斷增長的趨勢，但卻少有證據證明國際組織能使強權國家做出與現實主義相悖的行爲。<sup>68</sup> 聯合國（United Nations）算得上是世界最具有權力的國際組織，但是它依舊不能制止美國 2003 年執意攻打伊拉克的獨斷。因爲它的主要決策機構（尤其是負責國際和平與安全這種攸關國家生存問題的部門）——安理會，本身就是一個縮小版的權力競技場。只要其中另何一個常任理事國對於權力的分配感到敏感或是無法接受，就不可能通過具有拘束力的決議案來制約國家的行爲。<sup>69</sup> 美國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它雖然經常會因爲特定的議題需要而參與國際組織，但是如果組織的運作不能如其預期的進行，美國多半是選擇拋開國際組織，單邊的依照國家利益行事。<sup>70</sup>

- (2) 有人認爲，全球化或國家間經濟的互賴將使得國家在國際政治的重要性日益縮減。特別是，區域性或世界性的國際經濟組織將成爲國際關係的主導，而強權國家將成爲國際政治中的邊緣。對此，米爾斯夏默反駁道，國家的重要性並不會因全球化或是經濟互賴而下降，因爲實際上沒有一個合適的替代品能取代國家。即便國家消失了，國際政治中也還是會有新的政治單元體出現，成爲國際政治中接替國家的新行爲者。但這也不意謂著國際間衝突與權力鬥爭的現象將結束。現實主義的所有核心思維係源自於無政府

---

<sup>68</sup>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1 (1995), pp. 82-93; 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2 (1998), pp. 729-757.

<sup>69</sup> Thomas G. Weiss, "The Illusion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6, No. 4 (2003), pp. 147-150.

<sup>70</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64.

狀態，至於組成系統的單元是何種性質並非該理論真正關切之所在，它可以是國家、宗教組織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單元。只要國際社會不是朝向一個等級制的結構發展，無政府狀態對於國際政治結構中的組成單元的影響就不會改變。<sup>71</sup>

從上述攻勢現實主義的一些觀點，吾人可以看出該理論與守勢現實主義同樣係屬於結構形塑 (shape) 論者。<sup>72</sup> 兩者均十分著重從無政府狀態和國際體系的結構 (即國家間權力的分配) 來解釋與認知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雖然對於國際法律規範沒有投以太多的注意，但其輕忽國際法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卻是清晰可見。<sup>73</sup> 而攻勢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律規範較為清楚評價可從米爾斯夏默在一篇探討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功能的專文中，找到線索。<sup>74</sup>

首先，米爾斯夏默將制度定義為：一組規定國家彼此間應如何進行合作與競爭的遊戲規則。在這規則之中，哪些國家的行為可以被接受或允許，哪些則不行，均有規定。這些規則是國家談透過判達成的結果，其目的是為了規範國家彼此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sup>75</sup> 國際制度並非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而是個別主權國家之間「分散化」(decentralized) 的合作。由於每個國家多少都擁有一些攻擊性的軍事能力，此種能力使得國家彼此間具有傷害或是摧毀對方的可能。換句話說，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具有一種潛在的危險。雖然不是每個國家都心懷惡意，但因為國家之間永遠沒

---

<sup>71</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72.

<sup>72</sup> 無論守勢還是攻勢現實主義，均可被歸類為結構現實主義之下。參考：Kaufmann,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op. cit.*, p. 678.

<sup>73</sup> 詳細說明請參考本節第一部分：守勢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sup>74</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p. 5-45.

<sup>75</sup> *Ibid.*, pp. 8 (note 17); 9-11.



有辦法確切的掌握對方的意圖 (intentions)，因此以武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彼此攻擊的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在這樣的環境下，國家首要目標當然就是設法維護自己的生存安全，由於缺少維持國際秩序的權威機構，國家必須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來實現自我安全。因此基於生存的需要，國家間可能達成合作，但是今天的盟友極有可能成為明日的敵人。

因此，依據米爾斯夏默的看法，制度對於國家的行為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sup>76</sup> 他甚至表示，制度對於國家追求權力的行為與恣意，根本無法予以有效阻止。<sup>77</sup> 任何的國際法律規範或是制度不過只是提供解決合作過程中欺騙問題發生的方法，其目的說穿了就是要限制國家的行為，但對於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自利的及渴望生存安全的觀點並無法提出有力的反駁。<sup>78</sup> 簡言之，攻勢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評價比守勢現實主義更顯悲觀。雖未到全面否定國際法的地步，但已充分表現出權力優位的色彩，不但強調國際政治中權力對於國家生存的關鍵影響，更進一步以權力壓倒一切的認知，來解釋國家與國際制度間的互動關係。故而，吾人可以說攻勢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律規範係採取一種極度貶抑及輕視的態度。

### 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 的主要思想是：國家的外交政策會受到國際體系，特別是體系構成員間「相對物質權力」(relative material power) 的影響。此派別認為，相對的物質

---

<sup>76</sup> *Ibid.*, p. 7.

<sup>77</sup>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op. cit.*, p. 82.

<sup>78</sup> 導引國家行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動機就是「生存」，米爾斯夏默援引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來說明國家為何致力於保障本身地位的獨立和自主。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p. 10-14 and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op. cit.*, pp. 10-11.

權力決定一國外交政策的主軸或其對外行爲的模式。此一觀點係源自修西迪德 (Thucydides)「強者得任性恣意而爲；弱者僅能默默承受苦難」(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的現實主義思考。<sup>79</sup> 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時認爲，一國的外交決策並非全然遵守客觀的實力分配原則，尙有必要審視與一國內部社會有關的因素和政府結構，因爲這些現象也會對一國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sup>80</sup> 進一步說，新古典現實主義將理論的研究焦點置於客觀物質權力與外交政策間的關聯性上。此派學者認爲外交政策實際上係由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或是少數菁英決定，因此這些決策者對於相對權力的認知是決定國家採取何種對外行爲模式的關鍵。<sup>81</sup>

關於新古典現實主義有幾本較具代表性的著作，諸如：薩卡利亞 (Fareed Zakaria) 對美國在世界政治中角色與外交行爲的探討、伍爾弗斯 (William C. Wohlforth) 對蘇聯的分析、克里斯汀森 (Thomas J. Christensen) 論中美關係，以及舒威勒 (Randall L. Schweller) 對二次大戰交戰雙方外交政策的解讀。前述這些學者

<sup>79</sup>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原型 (archetype) 可上溯至修西迪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該書將理論基礎建立在如下的前提：導致戰爭的真正原因是由於雅典 (Athens) 實力的增長激起了斯巴達 (Sparta) 的警覺。接著該書描述體系中的誘因是如何透過單元層次的變量 (unit-level variables) 進入希臘各城邦國家的外交政策之中。相關文獻可參考：Gide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146-154; Paul A. Rahe, "Thucydide's Critique of Realpolitik,"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2 (1995), pp. 101-103; Alexander Kemos, *op. cit.*, and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p. 23-24.

<sup>80</sup> 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爲，守勢現實主義和國內政治理論 (Innenpolitik) 過於強調國家對外部威脅的反應，忽略了這種反應多半是基於相對物質權力所決定的客觀事實。而攻勢現實主義的問題在於，單單依靠體系結構無法精確地闡釋國家對外行爲的各種情況。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除了把體系結構因素看成一項重要的變量之外，還同時予以考慮國內因素對於一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sup>81</sup> Gide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146-147.

的著作都是關於國家對其物質權力強弱反應的研究，首要目標都是在傳統現實主義研究範式的框架內就相對實力對一國外交政策的影響進行更深一層的解析與評價。<sup>82</sup>

在承繼相對物質權力對國家行為具有主導作用的同時，新古典現實主義指出，權力的效能是間接（indirect）和不確定的（problematic）。<sup>83</sup> 因此該理論引入一個中介性變量（intervening variable），即政策決定者對權力的「認知」（perception）。<sup>84</sup> 藉由這個變量的提出，國際體系的結構就不再是直接或唯一影響國家對外行為的因子，而是必須經過決策者認知的「過濾」（filter）。傳統現實主義（指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及以華茲等人為代表的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的解釋係以體系結構和權力分配作為根據，學者弗萊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說：在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裡，對相對權力的計算與評估可作為聯繫國家客觀實力變化與行為之間無形的橋樑。<sup>85</sup> 對此，新古典現

---

<sup>82</sup> *Ibid.* Those scholars' writings are: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至於著墨在理論本身探討的文獻，可參考：Daniel Byman and Kenneth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107-146;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64-186.

<sup>83</sup>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 157.

<sup>84</sup> *Ibid.*

<sup>85</sup>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3. 即便是自由主義的學者，例如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對大部分體系理論者而言，體系結構與行為體的行為之間是由一理性的假設而成聯繫。結構論者由此推導出國家對國際環境提出的誘因和限制作出反應。詳細說明可參考：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實主義批評道，客觀相對權力與國家行為間這種公式性的聯繫觀點是不精確和令人難以理解的。事實上，國際間權力的分配需要透過影響負責決定政策官員的決定，方能驅使 (drive) 國家的行為。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對於國家外交政策或是行為的研究，除了詳細探究每個國家的決策者對客觀情勢的實際理解之外，別無其他更好的選擇。<sup>86</sup>

上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說明了決定外交政策行為的因素並非完全取決於一國本身權力的強弱和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分配，個別國家決策者對於權力的認知也是一項不可忽視的中介性變量。這點正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有別於其他現實主義派別的所在 (參考下表一)。<sup>87</sup>

---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67.

<sup>86</sup> Gide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 158. The similar implication of this conception can refer to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3 (1987), pp. 353-381.

<sup>87</sup> 關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發展，最近的一篇文獻是學者舒威勒 (Randall L. Schweller) 提出涉汲國內政治與權力平衡理論間關聯性的研究。作者在文中指出，複雜的國內政治過程宛如一條傳輸帶，具有修正、改變國家針對外在環境所做出的原有反應。因此，不同的國家即使面對相似的壓力或是機遇，也未必會做出相同的對外政策。毋寧，達成權力平衡的同盟行為並非國家面對危險時所必然為之的選擇。簡言之，體系層次的因素未必會比國家內部層次的因素具有更大影響國家行為的效果。詳細內容可參考：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op. cit.*, pp. 164-172. 除了決策者的認知外，新古典現實主義還導入了另一個中介性變量，即一國政府機關 (apparatus) 的強度 (strength) 和該強度與週遭社會環境的關係。該理論認為，粗略地評估國際權力的分配並不恰當，因為國家決策者經常不易準確掌握國家所有的物質權力資源。因此，關於權力的分析必須考察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舉例來說，對於 1972 年後中美關係的改善，許多學者認為是中美兩國為了平衡當時蘇聯而進行的短暫合作，是一種基於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的思考。但學者克里斯汀森 (Thomas J. Christensen) 認為，美中的合作是因為兩國的政治領導人在當時都缺乏足夠的國家政治權力來訂定自己原本預設的外交政策，因而不得不採用能被國內多數人接受的議題，即反蘇，作為政策決定的主要方向。詳見：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表一

理論類別	對體系的重視程度	對單元的重視程度	國家行為的因果邏輯	
古典 現實主義	不重視	重視	單元的 內部因素	→外交政策
結構 現實主義	重視	不重視	體系 的因素	→外交政策
新古典 現實主義	重視， 但對國家行為 的制約有限	重視， 但不忘考量體 系結構的制約	單元內部因素 & 體系本身因素	→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除了上述對於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解途徑不同外，新古典現實主義也不認同守勢現實主義視「安全」為國家對外政策首要目標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存在著重大理論缺陷，因為這項假設既沒有對不同國家的目標加以區別，也沒有考慮國家對外政策目標發生變化的可能性。<sup>88</sup> 譬如，對於那些偏好維持現狀（*status quo*）的國家而言，安全可以說是其對外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標，但對於那些不滿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來說，安全便不是其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sup>89</sup> 相較之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學者認為，國家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最大限度地謀求國家利益，盡可能的創造對己有利的國際環境，並在能力所及的範圍裏追求

Press, 1998), pp. 39-40;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

<sup>88</sup> Gide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146, 151.

<sup>89</sup> 法國的拿破侖（Napoleon Bonaparte）和德國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即是兩個最佳的例證。

本國權力的最大化。<sup>90</sup>

此外，對於國際體系的理解，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體系既不像古典現實主義和攻勢現實主義所說的那樣是霍布斯式的 (state eat state)，<sup>91</sup> 也並非如守勢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是平穩及安全充足的。相反的，體系是相當模糊的，處於無政府狀態中的國家很難確認安全究竟是否足夠，它們只能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去面對各種不確定的國際政治現實。另外，針對守勢現實主義關於國家可以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從而約束自身行為的假設，新古典現實主義反駁道，國家很少能從過去發生的某一具體事件中得到教訓，而且一國得到的教訓也未必與他國相同，同時各國回應教訓及累積經驗的方式也是不一而足。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守勢現實主義者將他們理解的國家「應然」行為當做國家的「實然」舉措，其結果只是將歷史中國際體系反復出現的權力爭奪當做一種反常現象來看待，這樣的理論不能算是一種解釋力充足的理論。<sup>92</sup>

綜上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既吸收了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觀點，又承繼了古典現實主義著重個體 (individual) 單位層次分析的研究方法，將決策者的認知和國內政治因素等新的變量引

---

<sup>90</sup>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p. 194. 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薩卡利亞 (Fareed Zakaria) 將自己的理論稱為「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 (state-centered realism), 參考: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p. 337。法蘭科爾 (Benjamin Frankel) 和琳恩-瓊斯 (Sean M. Lynn-Jones) 將薩卡利亞的學說規類為攻勢現實主義，而另一位學者羅斯則將其列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分類不一致的情形，吾人可以發現現實主義內部派別的複雜性和彼此間難以釐清的關聯性。至於守勢現實主義對薩卡利亞批評的回應可參考: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1998), pp. 157-182.

<sup>91</sup>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1995), p. 229.

<sup>92</sup>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op. cit.*, pp. 192-196.

入分析國家行為的框架中，從而使得現實主義理論在應用上更為貼近它所欲解釋的現實世界。<sup>93</sup> 以這樣的了解來探究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評價與定位，吾人可推知在該理論下規範或是制度的功能並未受到直接的否定，但因為強調外交政策會受到國際體系，特別是體系構成員間「相對物質權力」的影響，因此與結構形塑論的現實主義者相同，新古典現實主義否認任何的規範或是制度具有獨立的功能。因為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必須儘可能的追求權力以保障己身的安全，規範或制度僅僅被認為是一種幫助國家便於達成目的或實現利益之工具。然而，因為該理論對於國家行為的解釋還必須考量決策者對於客觀環境的認知以及一國政府機關的強度和該強度與週遭社會環境的互動，故而導致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定位與評價顯得較為彈性與開放，非如同結構現實主義那般地悲觀。

舉例來說，同樣的事件，大國彼此間的反應便可能不同。美國在伊拉克是否設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的問題上，就與法、德、中、俄等大國的態度迥異，可以說是一意孤行，不惜拋開聯合國此項國際機制及其昔日盟友，單邊地採取軍事行動，枉顧國際法。<sup>94</sup> 而即便是同一個國家的同一決策者，也可能因為對於國際情勢的認知或是觀念發生轉變，而採取不同風格的外交政策。以中美關係為例，柯林頓政府時期的中國政策便有前、後期明顯的不同；<sup>95</sup> 而小布希政

---

<sup>93</sup>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pp. 344-345.

<sup>94</sup> Richard Overly, "History Will Damn Them: We must not Accept Our Leaders' Illegal Occupation of A Sovereign State," *The Guardian* (March 20, 2004), pp. 23-25; Daryl G. Kimball, "Iraq's WMD: Myth and Reality," *Arms Control Today*, Vol. 33, No. 7 (2003), p. 2; Leon Gordenker, "What UN principles? A U.S. debate on Iraq," *Global Governance*, Vol. 9, No. 3 (2003), p. 283; Greg Shafer, Lewis Lapham and Samuel Johnson, "Lessons from the U.S. War on Iraq," *The Humanist*, No. 63 (July/August 2003), p. 14.

<sup>95</sup> 柯林頓就職時，施政焦點主要在內政，至於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則是調整為加強美日伙伴關係，希望日本能承擔亞洲部分軍事業務、防止武器擴

府對於伊拉克的問題在前、後任期間，也顯現出對於國際合作與國際制度不同的依重程度。<sup>96</sup>

可見，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然承繼了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相對論觀點，但在國際法律規範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力上，並未給予直接的否定或是採取類似結構論者那樣的悲觀態度。透過對於單位層次的進一步分析，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的觀點可以說是採取一較為中立與溫和的態度。

---

散、支持當地民主改革。對於中共政策方面，由於當時領袖互信不足，加上天安門事件，使得雙方政治往來基礎薄弱。1993年柯林頓政府實施其競選政治立場，以最惠國待遇迫使中共改善人權，制定人權與貿易「掛勾」的行政命令。但當以工商利益集團為核心的力量佔上風時，柯林頓又轉而採納財政部等的意見，宣布「脫鉤」政策。學者認為柯林頓政府所以會在中國政策上做出調整，實與當時中國大陸內部經濟情勢變化有關，由於國際貨幣基金（IMF）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可列世界第三大國，加上美商大舉進入大陸市場進行投資和貿易，不少利益團體開始積極遊說柯林頓解除對中國的經濟制裁。至1993年年底，美國對中共開始採取全面接觸（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政策。詳細分析請參考：胡惟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七章；王德育，「美國柯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美歐月刊**，第九卷十二期（1994年），頁30-38。

<sup>96</sup> 2003年3月20日，冷戰時期結束後的唯一強權—美國，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下，逕行以「先制自衛」（anticipatory self-defense）的主張為由，出兵攻打伊拉克，引起國際法和國際政治上許多的爭論，同時也是對聯合國本身及其憲章下集體安全制度（collective security）的莫大傷害。戰後美國隨即由國務卿鮑威爾（Collin Powell）於4月10日表示：「美國與其主要盟邦—英國，將計畫密切掌控所有伊拉克的物質和政治重建事務。」而小布希政府也一直聲稱美英將主導戰後伊拉克事務，「聯軍在伊拉克戰爭中流血，在戰後於伊拉克發揮主導作用是順理成章，聯合國僅能扮演配角」。參考：Patrick McLain, "Resolution 1441 and Parallel Justifications for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Iraq,"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Vol.13 (2003): 267-272. 但隨著美軍在伊國的軍事安全花費和人員死傷不斷，小布希政府開始軟化先前的態度，向國際籲請共同加入伊拉克的戰後重建，並積極在聯合國安理會推動相關決議，好使其早日爭脫泥沼。參考："UN Remains Critical In Post-War Iraq," *Yale Global Online*, via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4908> (1 June 2005), 而在2004年年底小布希競選連任獲勝後，其外交政策則更趨於務實並較之以往溫和，這可從其近日出訪歐洲，企圖修復與歐陸大國的關係窺見端倪。參考：Tom Raum, "Bush Seeks to Mend Fences on Euripe Trip," *ABC news*,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wireStory?id=515892>, (1 June 2005).



## 伍、英國學派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學者艾爾美達 (João Marques de Almeida) 曾指出有三個原因使得英國學派易被歸類為現實主義：一、該學派的研究焦點，如無政府狀態、主權國家等，正是現實主義者所重視的問題；二、該學派對於國際秩序的強調遠大於正義或其他攸關國際的經濟問題；三、對於國際規範的相關研究力道遠遜於新自由主義或是建制理論 (regime theory) 者。<sup>97</sup> 此外，由於英國學派十分重視國際秩序、權力平衡及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 的相關研究，因此也不乏有研究者視其為現實主義理論範式的一個分支。<sup>98</sup> 本文採取與上述相同的觀點，將英國學派置於現實主義之下，並就其有關國際法律規範的論述進行討論。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英國學派 (English School) 可溯源於 1950

---

<sup>97</sup> João Marques de Almeida, "Challenging Realism by Returning to History: The British Committee's Contribution to IR 40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 294.

<sup>98</sup> 將英國學派視為現實主義理論範式之一的學者有：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4), p. 98; 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吉爾平 (Robert Gilpin) 則將英國學派中研究「國際社會」的學者布爾 (Hedley Bull) 定位成古典現實主義者，請參考：Robert Gilpin,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in J. D. B. Miller and R. J. Vincent eds., *Order and Violence: Hedley Bu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12-139; 阿希利 (Richard Ashley) 和渥克 (R. B. J. Walker) 則認為英國學派是有別於華茲 (Kenneth N.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而在內容上趨近於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 古典現實主義的「規範性現實主義」(normative realism)，參考：João Marques de Almeida, "Challenging Realism by Returning to History: The British Committee's Contribution to IR 40 Years On," *op. cit.*, p. 274; R.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2-34. 此外，因為著重制度 (institutions)、建制 (regimes) 對國家行為的作用和影響，故而也有學者認為英國學派可被歸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一支。參考：Tony Evans and Peter Wilson, "Regime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Millennium*, Vol. 21, No. 3 (1992), pp. 329-351.

年代左右，該學派長期以來係處於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的非主流地位。<sup>99</sup> 此學派的研究重心為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認為這個概念是國家間利益及認同的制度化體現。它們考察國際社會的起源、發展以及其與世界秩序的關係，指出：國際社會就是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念，進而組成一個社會。毋寧，當國家認為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受到一套共同規範的制約，而且彼此一起建構了一套共同制度的時候，國際社會便於焉浮現。換句話說，國際社會的存在以國家間具備共同利益、共同價值和觀念等因素為先決條件。英國學派將國家共同承認的規範、規則或是制度的維持與創立視為其理論發展的一項重點。<sup>100</sup>

從英國學派對國際社會的研究內容來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該學派是繼承了格勞秀斯 (Hugo Grotius) 關於國際政治是一種社會狀態、國際衝突受制於共同規則的觀念，<sup>101</sup> 並以此為基礎對國際社會加以界定並展開分析。最先明確提出國際社會是項概念的是曼寧 (Charles Manning)，他認為相對於有共同權威的國內社會而言，國際社會的存在有其特殊性，即它並非以一種實體存在，而是人類觀念下的產物。<sup>102</sup> 另一學者懷特 (Martin Wight)，運用

<sup>99</sup> 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1981), pp. 1-13. 導致這個現象的可能原因是英國學派較著重用歷史、法律或哲學的研究方法來闡釋國際政治，使其欠缺實用性。但該學派批評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在理論建構時不僅傾向去解釋世界政治，而且還常常受到國家外交需求的驅使，設法去預測國際關係的走向。參考：William A. Callahan, "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English School and I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esented at IR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British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中國人民大學，2002年4月22日)，頁9。筆者個人認為，若就理論內在的完整性及品質而言，英國學派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和世界社會等概念的歷史基礎、哲學內涵和分析方法，較之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更為豐富與週延的。

<sup>100</sup> 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4 (2001), pp. 423-441.

<sup>101</sup> Hedley Bull, Benedict Kingsbury, and Adam Roberts eds., *Hugo Grotiu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p>102</sup> Charles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G. Bell and

歷史和哲學的方法把國際關係研究的爭論分類為現實主義（re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三種不同流派。此三個流派不僅與當代的國際關係相聯，也與之前的人類歷史相關，這正好說明了英國學派不僅僅注重研究客體的本身，也著重客體背後所具有的歷史淵源。

在討論英國學派的理論內涵及該學派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認知時，布爾（Hedley Bull）所著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The Anarchical Society*）一書是相當經典的著作。<sup>103</sup> 布爾將國際政治中的秩序定義為一個現實的或者是可能出現的情況，而非一個價值或目的。因此，在他的觀念裡秩序與正義間不是一種等同關係。<sup>104</sup> 布爾在分析國際政治的秩序時，並未強調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作用，而是把秩序視為一個能夠，且實際上獨立於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存在的現象。他說，雖然秩序的維持確實有賴於客觀規範的存在，而在現代國際體系中，具有國際法地位的那些法律規範，一直在維持秩序的過程中發揮著較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要完整的理解國際秩序，吾人便不能不重視那些不具法律地位的規則及其作用。布爾表示，研究者應該注意那些不需仰賴國際法律規範的國際秩序模式，它們將來可能出現，甚至在過去既已經存在。因此，布爾認為除了國際法之外，諸如：權力平衡、外交、大國的作用以及戰爭等也同樣是國際社會的有效制度，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聯合國（United Nations）這類的國際組織，套句學者懷特的話，「只是一種擬制的制度（pseudo-institutions）」。

---

Sons Ltd., 1962).

<sup>103</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6-50; Hedley Bull, "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 42.

<sup>104</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op. cit.*, pp. xiii- xiv. 這正足以說明何以有人將英國學派歸類為現實主義。

布爾認為，國際社會的特徵就是各個國家在共同制度（common institutions）中（例如：國際法、外交行為規範及國際組織的章程）建立起共有的利益，並且進而在互動過程中遵守彼此均能接受之共同規範的拘束。不過布爾也表示，有了互動並不一定代表國家在共同的制度下共享了規範、利益或是價值。共同的規範、利益和價值是在國家互動中，透過溝通、合作等社會行為產生的。<sup>105</sup> 也就是說，所謂的國際社會是在國際體系形成之後，才逐漸出現的。<sup>106</sup>

簡言之，布爾認知的國際社會不須建立在各國擁有一致的文化基礎上，而是藉由國家間的往來所逐漸形成的共同利益觀和歸屬感達成。<sup>107</sup> 這無疑為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與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建制理論（regime theory）塑造了一種聯結。<sup>108</sup> 換句話說，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產生的共有利益係有助於國際規範的發展。事實上，布爾對於國際社會概念的理解近似於「國際秩序」，他本人將秩序定義為「促進某些共同目的及價

---

<sup>105</sup>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

<sup>106</sup> 「國際社會」的概念在英國學派中被理解為是國家間利益與認同的制度化，筆者以為此概念在某程度上係與建制理論如出一轍（關於英國學派與建制理論的關係可參考：Tony Evans and Peter Wilson, "Regime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Millennium*, Vol. 21, No. 3 (1992), pp. 329-351.）。國際社會著重的是共有規範對體系中成員的主觀構成（constitutive）效果。懷特（Martin Wight）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實寓於國家間有意識的維持權力平衡及確保彼此外交行為一定的獨立與自主，而國際法即是達成此目的方式之一。參考：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pp. 96-97.

<sup>107</sup> 關於布爾的這種觀點，學者布桑（Barry Buzan）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說，國際社會不必以各國擁有一致的文化作為基礎，即可生成。國家只要能進行交往並從中培養出共同的觀念和認同，國際社會就能夠產生。詳見：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1993), pp. 349-352.

<sup>108</sup> *Ibid.*, pp. 327-352.

值所形成的社會安排」。<sup>109</sup> 共同目的及價值的實現是作為獲得其他更進一步利益和價值的前提基礎。這些共同的目的包括了：國家體系的維繫、國家主權原則的確立、使用武力的規範和對於條約的履行及尊重。<sup>110</sup> 國家必須明瞭這些共同目的的實現是達成已身長久利益的先決條件，如此才能維持彼此互動關係的秩序，跳脫純然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

在探究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此一問題時，布爾發現國際關係的歷史中有三種相互競爭的社會類型（觀念），它們分別是：一、霍布斯主義或現實主義（Hobbesian or realist）的傳統。把國際政治看作一種戰爭狀態；二、康德主義或世界主義（Kantian or universalist）的傳統，認為國際關係發生的場所是一個潛在的人類共同體；三、格勞秀斯主義或國際主義（Grotian or internationalist）的傳統。把國際政治看作是發生在一個「社會」中的活動，或者是發生在一個由於成員在無政府狀態下渴求秩序與和諧，因而形成的共同體中的活動。<sup>111</sup> 事實上，吾人可以看出上述布爾提及的三種傳統，正好反映出構成國際關係基本內容的三個面向，即國際政治權力的鬥爭（衝突面）、國際和諧與責任的共同分擔（合作面）、以及國際法律規範（制度面）。而布爾本人也指出，在無政府體系中，秩序的建立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為它忠實反映出國際政治的衝突以及合作。<sup>112</sup>

從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中，吾人可以發現該學派的理論具有一種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成分，使其能作為兼具現實主義的結構理論及自由主義的制度理論之折衷。一方面它承認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法理上的），所以能與現實主義的重要概念，如

<sup>109</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op. cit., p. 4.

<sup>110</sup> *Ibid.*, pp. 16-19, 67. 另一位英國學派的學者懷特也係採取類似的觀點。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Harmonsworth: penguin, 1979), p. 105.

<sup>111</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op. cit., p. 24.

<sup>112</sup> 布爾更進一步引用學者凱爾森（Hans Kelsen）的觀點，道出國際法非集中化及依賴國家自助的特性，*Ibid.*, pp. 130-131.

權力平衡、安全困境等論述接軌。另一方面，它又認為國家間分享著共同的制度和規範，係在一近類社會結構的空間下進行互動。這種社會性及其內含的共同規則是超越於個別國家的國際制度，也就提吾人所謂的國際法律規範。毋寧，英國學派的現實主義觀點對於國際法係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並在這樣的認知上提出國家必須遵守這些共同目的基本規範，才能實現本身更多利益及有效維持自身所處的國際社會之秩序此一說法。

## 陸、結論

從前述不同現實主義派別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理解，吾人發現現實主義視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的事實與國家缺乏安全及國家間彼此的權力爭奪具有不可避免的因果關係。但誠如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所說，自助和權力鬥爭並非無政府狀態的本質，它們僅是一種制度。<sup>113</sup> 無政府狀態的內涵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所強調的自助和國家對於權力的爭奪，皆非無政府狀態下會必然存在的現象。更嚴謹地說，自助與權力鬥爭是現實主義設想出一種存在於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的「常規模式」。

依照英國學派現實主義者的看法，如果上述的常規模式已為各國所認同並實踐，則代表著自助與權力鬥爭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享規範，進而使得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成為實然的國際政治特色；<sup>114</sup> 反之，當各國不認同這樣的常規模式時，自助與權力鬥

---

<sup>113</sup>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393.

<sup>114</sup>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77-79. 建構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本身並沒有既定的（the given）的本質，它的內涵是開放性的。換句話說，國際政治結構的內容並非固定的，而是具有選擇空間的。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只能代表其中的一種可能，但實際上國際政治會呈現何種無政府狀態，主要還是

爭就不會伴隨著無政府狀態而出現。其次，若是依照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看法，則不同國家的決策者對於無政府狀態的認知並不必然一致。因此，至少就短期來說，國家對於無政府狀態的回應可以是創立法律制度以促進彼此的合作或是降低衝突爆發的可能；也可以是建立相互競爭的自助模式，以戰爭作為生存的鐵則，視法律規範或制度為無物。可見，單就現實主義來分析無政府狀態此項國際政治的現象，不同的派別即存有不同的理解，從而獲得無政府狀態內涵係屬「多元可能」而非「單一固定」的研究發現。

另外，在分析過程中本文發現現實主義慣於將國家的認同（identity）與利益（interests）視為外生性的（exogenous）。<sup>115</sup> 然而國家的認同是該國對於自己及其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何等角色的認知，會因為涉汲不同的領域而有所變化。舉例而言，美國在軍事事務上，對於自己的認同是一領先國際的高科技軍事大國，並擁有優異的核武實力。但在國際貿易的領域，美國對於自己的認同則是迥不同於軍事。至於國家利益則是源自於國家的認同，往往可在一國特定的外交政策中被反映出來。對現實主義者而言（尤其是守勢現實主義和攻勢現實主義），國際法律規範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幫助國家實踐其利益的工具，至於國家參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後是否會產生認同改變的效果此一問題，現實主義並沒有認真研究這樣的可能性。<sup>116</sup> 析言之，現實主義偏

---

決定在國家相互間的共同認知與往來的實踐。參考：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422-425.

<sup>115</sup> Rodney B. Hall, "Dialectics as Constitutive Process in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Systems: From Concrete Totality to Context Sensitivity," For delivery at *Fifth Pa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The Hague, Netherlands 9-11 September 2004. A previous draft of this paper was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on "History, Systemic Transformations, and IR Theory" 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at Gregynog / Newtown, U.K., 27-29 April 2000.

<sup>116</sup> Ronald L. Jepperso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43;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向關注國家遵守國際法律規範的效果是否符合其利益，而未注意到法律規範是否會改變國家的認知。此種研究上的疏漏一來造成現實主義本身對於國際法的輕忽，而未能給予國際法中肯適當的定位；二來則是與國際政治的客觀事實相違，因為在某些情形下，國際法律規範確實能改變或修正國家的認同，從而對其行為產生或多或少的制約及影響。

爲了證明國際法律規範對於國家認同及行為確實能產生影響，守勢現實主義者熊玠 (James C. Hsiung) 曾分別就體系價值 (systemic values) 與制度學習 (institutional learning) 的面向切入，提出如下的看法：<sup>117</sup> (1) 體系價值：現實主義將權力當作國際政治中最重要決定因素，但實事上有另一因素是與權力相對的，即「體系價值」。這個觀念起源於一些國內或國際因素，但後來被各國廣泛接受，至少是被相當數量的國家所承認。例如：十八世紀的君權神授、十九世紀的殖民思想，以及二十世紀的民族自決原則。體系價值的力量不同於現實主義的權力概念，在初期它可能僅具有道德上的說服力，但隨著被各國普遍接受，它便具有形塑國家認同及衡量國家行為的功能。而這種作用的大小取決於各國對體系價值的信服程度；(2) 制度學習：學習指的是將原本由規範規定的行為逐漸調整爲習慣趨駛 (habitual driven) 的行為。某些在時間點 A 創立的法律規範，有可能在時間點 B 因符合當時盛行的觀念，而被大範圍的採用。例如從 1963 年開始的禁止部分核測試條約 (Partial Test Ban Treaty) 到 1992 年戰略武器裁減條約 (START 2)，將近 30 年的期間裡，從美蘇兩強的談判，到整個國際社會的限武運動，國際法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實際上比一般人認爲的更大。<sup>118</sup> 或許就像拿汀 (Nardin) 所言，國際法是

---

Politics,” *op. cit.*, p. 391;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71.

<sup>117</sup> 詳細的理論說明可參閱：James C. Hsiung, *Anarchy & Order*, *op. cit.*, pp. 33-35.

<sup>118</sup> 即便是純粹結構理論趨向的現實主義者，也未否認規範與學習 (模仿) 對



一種以規則為導向而非以結果為導向的行為準則。<sup>119</sup>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現實主義的理解受限於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這樣的標籤，從而視現實主義與國際制度或國際法為水火而不相容！但透過本章的研究，吾人發現採用現實主義理解國際關係，不意謂著就必須對國際法持以否定的態度。也就是說，在現實主義與國際法律規範之間，存在的不是一種絕對的互斥關係，不同理論派別在選擇採取何種分析層次上的差異，將左右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認知與評價。非結構理論型的現實主義，如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法便採取正面肯定其功能的態度。而結合體系層次與單元層次，或是強調結構與能動者（agent）間互動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及英國學派現實主義，則是對國際法抱持開放與彈性的立場，其中又以後者更為清楚的點出國際法對於國際秩序的穩定具有正面裨益。至於方法論上強調客觀與物質基礎的結構形塑論者，如守勢現實主義和攻勢現實主義，雖然對國際法律規範抱以否定和輕視的態度，但也未全然排除在符合國家利益的時候，國際法所具有的工具性及其效能。<sup>120</sup>

（收稿：2005年4月11日，修正：2005年6月3日，接受：2005年6月27日）

---

於國家行為的影響和這種影響的可能性。詳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76-77; 118.

<sup>119</sup> Terry Nardin, "International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8, No. 1 (1992), pp. 19-30.

<sup>120</sup> 關於現實主義理論範式下各派別對於國際法律規範的認知與評價，可參見本文表二：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表二：現實主義的國際法觀

<div style="text-align: right;">A</div> <div style="text-align: left;">C</div> <div style="text-align: right;">B</div>	古典 現實主義	守勢 現實主義	攻勢 現實主義	新古典 現實主義	英國學派 的現實主義
個體理論 (單元層次)	<b>承認</b> (務實的國際法「存在論」, 強調國際法律規範的虛弱性)				
結構理論 (系統層次)		<b>否認</b> (國際法是虛無的規範; 其是否為國家所接受, 取決於其所具有的工具性)	<b>否認並輕視</b> (國際法是虛無的規範, 對於國家追求權力的行為, 根本無法予以有效阻止)		
系統層次 & 單元層次				<b>不承認也不否認</b> (雖否認國際法律規範的獨立性功能, 但整體上係持一開放性的立場)	<b>承認</b> (一方面強調體系成員彼此間及體系成員和體系本身互動的「社會」性; 一方面將國際法視為此種社會現象中的一組 <b>規則</b> )

附註：A：代表現實主義的派別

C：代表理論採用的分析模式

B：代表對國際法採取的觀點

\*：本表為作者自行繪製

## 參考文獻

- 王德育 (1994), 「美國柯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 《美歐月刊》, 9 : 12, 30-39。
- 胡惟真 (2001), 《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 徐曉明 (2002), 「權力政治學派不是國際法虛無主義」, 《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3, 66-68。
- Arend, Anthony C. Robert D. Vander Lugt and Robert J. Beck (1996),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sgarkhani, Abumohammad (1995), *Hegemony, Challenge and Compromise [microform]: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as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in Conflict Resolu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 January 1981-January 1993*,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
- Baldwin, David A.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ck, Robert J., Anthony C.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eds. (1996),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itz, Charles R. (1999),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Chris (2001),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4, 423-441.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ll, Hedley, and Adam Watson (1984),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ull, Hedley, Benedict Kingsbury and Adam Roberts, eds. (1990), *Hugo Grotiu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yman Daniel, and Kenneth Pollack (2001),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4, 107-146.
- Carr, E.H. (195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6),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 Almeida, João Marques (2003), "Challenging Realism by Returning to History: The British Committee's Contribution to IR 40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3, 273-302.
- Donnelly, Jack (2000),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2003),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Evans Tony, and Peter Wilson (1992), "Regime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Millennium* 21: 3, 329-351.
- Friedberg, Aaron L. (1988),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eorge, Jim (1994),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harles L. (1994/1995), "Realism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50-90.
- Gordenker, Leon (2003), "What UN principles? A U.S. debate on Iraq," *Global Governance*, 9: 2, 283-289.
- Halliday, Fred (1994),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Hanami, Andrew K. (2003),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Hasenclever, Andreas,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1997),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rz, John (1976),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 McKay.
- Hsiung, James C. (1997), *Anarchy & Order: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James, Patrick (1995), "Structural Realism and the Causes of War,"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39: 5, 181-208.
- Jervis, Robert (1999),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42-63.
- Jones, Roy (1981),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7: 1, 1-13.
- Kaufmann, Robert G. (1994),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3: 4, 678-717.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Kimball, Daryl G. (2003), "Iraq's WMD: Myth and Reality," *Arms Control Today*, 33: 7, 2.

- Kingsbury, Benedict (2002), "Legal Positivism as Norm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lance of Power and Lassa Oppenheim's 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3: 2, 401-437.
- Krasner, Stephen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 Robert J. (1991), *No Common Powe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sup>nd</sup>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Lynn-Jones, Sean M. (1998),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2, 157-182.
- Lynn-Jones, Sean M. (2002), "Book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 2, 365-366.
- Manning, Charles (1962),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 Martin, Lisa L., and Beth A. Simmons (1998),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729-757.
- McLain, Patrick (2003), "Resolution 1441 and Parallel Justifications for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Iraq,"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13: 4, 233-291.
- Mearsheimer, John J.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5-49.
- Mearsheimer, John J. (1995),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82-93.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Mercer, Jonathan (1995),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2, 229-252.
- Miller, J. D. B., and R. J. Vincent, eds. (1990), *Order and Violence: Hedley Bu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genthau, Hans J.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sup>th</sup>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Olson, Mancur J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very, Richard (2004), "History Will Damn Them: We must not Accept Our Leaders' Illegal Occupation of A Sovereign State," *The Guardian* 20 March, 23-25.
- Oye, Kenneth A. ed. (1986),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he, Paul A. (1995), "Thucydide's Critique of Realpolitik," *Security Studies*, 5: 2, 101-139.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 144-172.
- Schachter, Oscar (1991),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M. Nijhoff Publishers.
- Shroeder, Paul W.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6),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 3, 90-121.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2, 159-201.
- Shafer, Greg., Lewis Lapham, and Samuel Johnson (2003), "Lessons from the U.S. War on Iraq," *The Humanist*, 63, 14-37.
- Snyder, Glenn H. (2002), "Mearsh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1, 151-159.
- Snyder, Jack L.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0/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128-161.
- Vasquez, John A.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4, 899-912.
- Vasquez, John A. (1983),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Thomas C. (1999), “Introduction: Morgenthau's Du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24: 1, 1-4.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Weiss, Thomas G. (2003), “The Illusion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Washington Quarterly*, 26: 4, 147-150.
- Wohlforth, William C. (1987),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39: 3, 353-381.
- Young, Oran R. (1986),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39: 1, 104-122.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e Perception and Appraisal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A Realist View**

---

Tan, Wei-en

(Maste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anarchy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not equal to chaos and disorder. In fact, the community where states exist is a mixture of self-help and cooperation, a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power and law. For this reason, how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im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is the main focus for scholars. This article relies on the re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 deliberate and analyze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Realism is not a single theory but a research paradigm, the content of this essay 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Realism which are Classical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including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Realism in English School. As the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ose who has limi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ealism to power politics usually think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r international law is incompatible with Realism. However, it is not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us to consider that Realism turns down international law. For instance, realism without using structural theory, such as Classical Realism, takes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role and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classical realism; defensive realism; offensive realism; English school.

